

地区冲突的体系根源： 美俄长期竞争与欧亚地区和平^{*}

王 玮

【内容提要】 俄乌冲突延宕至今，造成巨大人道主义伤害，国际社会普遍希望看到冲突降级并尽快恢复地区和平。2025 年以来，国际事态的发展让全世界看到了解决冲突与建立和平的希望。然而，冲突的性质先验性地决定着其解决的难度和限度。俄乌冲突是一场具有体系根源的地区冲突，是美俄长期竞争的系统产物。冷战后，美国为实现单极秩序诉求，在体系层面遏制全球挑战者，在重点地区防止单一大国主导地区事务。在欧亚地区，美国的政策有三大面向，一是改造冷战对手，二是拓展西方影响，三是处理同俄罗斯关系。美国视北约作为推行优势战略的最佳平台。欧盟也将前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候选国名单。西方共同体的扩大改变了欧洲政治格局，同时压缩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进入 21 世纪，俄罗斯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期，开始在后苏联空间重建影响力。美俄两种不同的秩序诉求发生激烈碰撞，俄乌冲突不过是其中一个悲惨片段。俄乌作为直接当事方虽有内在矛盾，但美俄长期竞争才是冲突的体系根源。近 30 年来，西方在“北约越大越好”的口号下不断推进全面优势战略，已经酿成“越大越不安全”的非预期后果。如果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否认自身责任，漠视对抗性外交政策的危害，那么，建立持久和平会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

【关键词】 大国竞争 单极秩序 地区秩序 北约东扩 后苏联空间

【作者简介】 王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2025 年度智库基础研究项目（ZKJC25250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审稿专家的批评指正，不足之处由笔者负责。

引言

2025 年初,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延宕已久的俄乌冲突迎来重大转机。2 月 18 日,美俄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结束俄乌冲突等问题达成共识。美俄外交接触标志着两国对结束俄乌冲突形成了初步共识。安理会决议的通过则标志着乌克兰问题迎来了政治解决的机会窗口。这些进展在事发几天前都是难以想象的。由此可见,美国立场的转变对俄乌冲突的走向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既然美国的政策转变能为和平带来希望,能避免更多不必要的伤亡,那么,美国为什么不早一点采取这些步骤?这不可避免涉及美国对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道义责任与实用价值孰先孰重的综合判断。拜登政府延续了冷战后美国的长期政策^①,从自由国际主义出发,愿意为“拓展民主、捍卫自由”承担责任,甚至不惜挑起大国对抗。不过,“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兴起以来,部分美国民众对自由国际主义的说教日益厌烦,认为对外干涉和对外援助毫无意义,不仅无法带来确切收益,还会增加纳税人负担,损害美国人民的整体福利。在“美国优先”政治氛围中,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俄政策思路。这不仅是对拜登政府政策的调整,也是对冷战后美国长期政策的修正。

回顾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美国一直推行“优势战略”,谋求“美国治下的和平”,并为此推动西方共同体的扩大^②。在相当长时间里,美国的政策不可谓不成功,以至于“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③。随着转型国家的加入,西方影响日益扩大,在欧亚地区扩展“自由民主秩序”的愿望愈发强烈。西方持续推进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G. John Ikenberry, *A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es of Global O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② Madeleine Albright, “NATO: Why Bigger Is Better”, *Economist*, Feb. 15, 1997, pp. 21 – 23; Michael Mastanduno,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 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1997, pp. 49 – 88; John M. Owen, “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2001, pp. 117 – 152.

③ [美]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自由主义国际议程，试图建立一个“自由主义帝国”（liberal empire）^①。西方在共同体内部推动新进入者“社会化”，在外部则要消除共同的威胁或挑战^②。这种持续的身份建构和自我肯定塑造了西方内部的同一性，也激发了西方向前推进的决心。让欧洲实现彻底的“去俄罗斯化”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政治选择^③。

当西方影响迫近俄罗斯周边核心地带时，情况变得极为不同。在后苏联空间，西方遭遇了俄罗斯的强力反制。西方想要前进得越多，面临的阻力就越大。可以说，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后苏联国家的现实处境，与俄罗斯同西方的长期竞争密不可分。在欧亚秩序问题上，俄罗斯和西方关系是决定性因素，而美俄两国是拥有否决权的终极博弈者。美国的欧亚政策及由此引发的俄罗斯的反应，是影响欧亚秩序变迁的最大变量，也是和平能否建立并维系的关键所在。

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从美俄战略互动角度，考察欧亚地区秩序演变的逻辑，在此基础上探讨俄乌建立和平的外部条件。本文首先讨论美国在欧亚地区的秩序诉求，即推进自由化攻势并以制度化方式扩展西方影响；之后讨论美国对俄政策为何从接触转向对抗；随后讨论美俄共识的崩溃与俄乌冲突的体系根源；最后探讨恢复和平的外部条件。

一 美国在“单极时刻”的自由化攻势

冷战结束对国际秩序特别是欧亚地区秩序产生了全方位影响。所谓“秩序”，指的是消除或减少无序的状态。秩序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人们对它的追求是

① Julian Pänke, “Liberal Empire, Geopolitics and EU Strategy: Norms and Interests in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Making”, *Geopolitics*, Vol. 24, 2018, pp. 100 – 123.

② Judith Kelley, “International Actors on the Domestic Scene: 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 and Socialization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3, 2004, pp. 425 – 45; Frank Schimmelfennig, “Strategic Calc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Membership Incentives, Party Constellations, and Sustained Complia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2005, pp. 827 – 860; Alexandra Gheciu, “Security Institutions as Agents of Soc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2005, pp. 973 – 1012.

③ Sergey Filatov and Andrei Volodin, “Russophobia: The Roots and the Crown”. <https://en.interaffairs.ru/article/russophobia-the-roots-and-the-crown/>, 访问时间：2024年2月15日。

永恒的，但秩序本身是历史性的存在，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限制^①。冷战时期是两极对抗格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各自阵营内部，建立起等级制（hierarchy）秩序^②。在这一阶段，国际秩序表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是阵营间激烈对抗，另一方面是阵营内相对和平。相应地，美苏两国也承担着双重角色，它们既是阵营对抗的“领导者”，也是内部秩序的维持者。

冷战结束后，美国迎来所谓“单极时刻”。苏联解体使国际体系从两极格局转变为单极格局。所谓“单极格局”，是指单一大国在地缘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它在国际体系中有能力阻止任何制衡它的重大联盟的出现。冷战后，国际体系中还有其他大国，如军事实力强大的俄罗斯，经济实力强大的日本和德国。但只有美国在各个方面都拥有强大的实力，因而，它在国际政治中享有特殊的优势地位^③。直到 21 世纪初，美国战略学界仍普遍认为自身优势并未受到根本挑战，认为其他竞争者连有意义的“软制衡”也组织不起来^④。可以说，美国对自身优势地位的自信助长了美国塑造“世界新秩序”的热切心态^⑤。

于是，美国国内逐渐形成共识，认为美国应致力于巩固世界领袖地位，防止任何潜在挑战者，同时大力向外推广民主。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声称，“在冷战时期，美国遏制对市场民主的全球威胁；现在，美国则设法扩展市场与民主的范围。基于美国的信仰和对权力政治的谋划，必须扩展世界上市场民主国家的自由共同体”^⑥。

① 关于国际秩序概念的讨论，参阅〔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与国际秩序》，张小明译，世界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 页；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 年第 1 期；门洪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研究》2004 年第 2 期；潘忠岐：《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 页；邹治波：《国际秩序的批判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5 期。

② David A. Lake, “Beyond Anarchy: The Importance of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2001, pp. 129–160.

③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1993, pp. 5–51.

④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72–108.

⑤ 〔美〕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80~281 页。

⑥ 关于克林顿政府的自由主义大战略，进一步参阅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68~371 页。

历史地看，威尔逊提出“让民主世界更安全”，是当时独特国内外环境的产物。在1916年美国选举中，威尔逊因为坚定反战立场而赢得连任。但在他上任一个月后，美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向美国国会说明情况的过程中，威尔逊发展出一套系统的行动逻辑。威尔逊勾勒的长期和平框架以消除侵略和帝国为条件。他认为，西式民主在全球范围传播，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在强烈传教士精神驱使下，威尔逊希望建立一个国家间组织，通过集体安全的方式解决争端，建立并维系和平。美国参战并塑造了战争走向，为其赢得了进行战后安排的发言权。威尔逊构思出一个改良式甚至是革命性的国际体系^①。此时，威尔逊已经有了领导世界的想法，并坚信“所有国家或迟或早都会接受美国的领导，吸收美国的原则和规范”^②。威尔逊的国际政治主张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思想。二战后，“几乎每位总统都表示要向威尔逊看齐”^③。

冷战后，以改良国际体系为宗旨的威尔逊主义再次迎来了历史性机遇^④。在自由主义思潮引领下，美国寻求全面改造冷战对手，使之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如果说美国在冷战时期采用的是防御性策略，其要旨是防止“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那么，冷战后美国采用的则是更具攻击性的策略，它不仅要冷战对手解除武装，而且要让它们完成相应的社会经济转型。美国要对原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国家发起一场更全面、更深入的自由化攻势。

这场攻势包含两方面主要内容，其一是经济自由化，其二是政治民主化。就经济自由化而言，早在20世纪70代末，新自由主义就已经在英美国家成为主流观点。8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得到里根和撒切尔的政治背书。它的主要机制是掠夺性积累，一是私有化和商品化，二是金融化，三是危机管控，四是国家再分配^⑤。新自由主义的巅峰期是1990~1997年，时值柏林墙倒塌，而世界金融

① Woodrow Wilson, *Why We Are at War: Messages to the Congress January to April 1917*,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17, p. 5.

② Richard H. Immerman, *Empire for Liberty: A History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from Benjamin Franklin to Paul Wolfowitz*,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58.

③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和秩序追求（1913~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

④ Robert W. Tucker, “The Triumph of Wilsonianism?”,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0, No. 4, 1993, pp. 83–99.

⑤ [美]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页。

危机尚未发生^①。当时，新自由主义势力强大到足以对俄罗斯强加重大社会变迁的地步，让后者接受了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方案。

就政治民主化而言，美国自威尔逊政府以来就寻求在国外推广“民主制度”。早在 20 世纪初，威尔逊就曾指出，“美国再也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除非在世界上实现民主、正义和和平，否则，美国国内的民主、自由就不可能持久地得到维持”^②。可以说，以“民主价值观”改造国际体系是美国外交的固有内容。两次世界大战后，在进行战后秩序安排时，美国都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如对德国和日本的战后改造。同样，美国不会错过在原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国家推行“民主化改造”的历史机遇^③。

总之，冷战后美国以胜利者自居，利用“单极时刻”的历史性机遇，寻求扩展“民主自由共同体”。为此，美国发起一场自由化攻势，强调原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美国组织并动员西方盟友，借助国际机构的制度工具，持续影响欧亚转型国家，进而推动国际和地区秩序变革。

二 北约、欧盟与西方共同体的扩大

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相互对峙，每个阵营内部都是一个小社会，都有针对成员的“规训与惩罚”机制。经过数十年的“反复灌输”，内部成员的态度、规范和价值都受到了社会化的塑造^④。两极格局瓦解之后，西方阵营仍然存在，社会化进程还在继续。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均势从此被打破，东西方交往也进入西方占据优势地位的时期。在西方看来，冷战结束意味着西方制度和生活方式胜出，西方因此获得了塑造冷战后世界的权力。

① [英] 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13 页。

② 李庆余、任李明、戴红霞：《美国外交传统及其缔造者》，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216～217 页。

③ Marybeth Peterson Ulrich, *Democratizing Communist Militaries: The Cases of the Czech and Russian Armed Forc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Robert W. Merry, “Bill Clinton and the Triumph of Wilsonism”,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ol. 13, Iss. 4, 1999, pp. 20–27.

④ [法] 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张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 页。

在美国及其盟友眼中，推动原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转型并转向，本身就是再造欧洲秩序的历史过程。按照西方主流观点，为了消除冲突的根源，必须让“民主和平”理念深入人心；为了实现持久的繁荣与和平，必须让“自由市场体制”生根发芽。这就需要通过让冷战对手作出改变，让它们在“达标”后成为西方成员。在高政治领域，北约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解散，反而被赋予更宽泛的使命^①。在低政治领域，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建立统一欧洲的梦想有了更大舞台。欧共体及后来的欧盟承担起了驯化候选国和新成员的职责。

冷战结束之初，北约成员很快发现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仍有不确定性。俄罗斯前途未卜，西欧还缺乏独自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两德统一的影响还有待评估。北约成员意识到，让北约转型可能比建立一个全新的机构要容易许多。波黑战争充分暴露出欧洲防务能力上的欠缺。一个让欧洲人难受的事实是，他们仍然需要北约，仍然离不开美国。之后，北约开始调整战略，并在冲突管理和危机应对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开启了东扩进程。

围绕北约东扩问题，支持者认为这会在三个方面推动东欧地区稳定。第一，西方对原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给出遏制俄罗斯安全威胁的坚定承诺。第二，北约扩大将减少成员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使其“接受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规范”。第三，它将促进民主化，而“民主国家不太可能相互争斗”，因此有助于稳定该地区^②。反对者担心其风险和成本，认为北约东扩会危及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导致俄罗斯退出军控合作、最终变得好战甚至走向极端民族主义。最终，支持者在这场辩论中获得了胜利。1999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界定了其在“未来全球化世界中的功能”，承诺构建更强大的跨大西洋“民主国家共同体”^③。

这样，北约作为集体安全组织，更准确地说是封闭的军事集团，在和平年代反而得到了强化。当然，北约“促进民主”的功效受到广泛质疑。有观察者指出，“取得北约成员资格既没有也不会推进欧洲民主化。冷战期间的记录是明确的，加入北约并不能让一个成员走向民主”。此外，“申请加入北约，并不要求

① Alexandra Gheciu, “Security Institution as Agents of Socialization? NATO and the New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2005, pp. 973 – 1012.

② Joseph Lepgold, “NATO’s Post – Cold War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1998, pp. 78 – 80.

③ Margarita Assenova, *The Debate on NATO’s Evolution: A Guide*, Washington: The CSIS Press, 2003, pp. vi, 5 – 6.

申请者加速民主化”。当时西方战略界的观点是，“脆弱的民主只会导致政治风险，因而不能操之过急”。基于此，西方应该“依靠欧盟来传播民主，这种方法更有可能促进民主化，而且不至于疏远俄罗斯”^①。

不同于北约，由欧共体转型而来的欧盟被寄予“帮助部分欧洲国家过渡到民主制”的厚望。《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了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引入建立政治联盟所必须的机构和政治改革^②。1993 年欧洲理事会提出“哥本哈根标准”，用以衡量特定国家是否达到加入欧盟的标准。它在政治方面要求候选国实行西式民主制度；在经济方面要求候选国实行市场经济；在法律方面要求候选国接受共同体/欧盟法律。1995 年曾与欧共体分庭抗礼的欧自联成员也都加入了欧盟。1997 年欧盟针对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提出国别性的政策期望^③。

总的来说，欧盟扩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要求候选国必须接受规则和规范，并完成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之后才有可能被接纳为成员^④。这种方式之所以富有成效，有几个深层次的原因。第一，冷战后欧洲一体化深入，欧盟从一个纯粹的西欧组织，逐步转型成为泛欧体制。欧盟承载的“统一欧洲梦想”富有感召力。第二，冷战结束之初，欧洲在经济领域占据优势，对原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国家有强大的经济吸引力。第三，从欧共体扩大到欧盟扩大，欧洲一体化的框架越来越稳定，先遵守规则再取得成员资格变成了一个标准化流程^⑤。冷战后处于弱势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为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社会秩序，本来也需要获得西方的援助。而当统一欧洲的繁荣前景给了它们更多希望时，部分国家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和西方主导的秩序安排。

① Dan Reiter, “Why NATO Enlargement Does Not Sprea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2001, pp. 41–67.

② 〔西〕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黄锦桂译，中信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94 页。

③ 杨友孙：《欧盟东扩与制度互动：从一个入盟标准说起》，世界图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④ 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 “Theorizing EU Enlargement: Research Focus, Hypotheses, and the State of Research”,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2, pp. 501–503.

⑤ 早先英国及欧自联其他成员也有这番经历。它们无法与欧共体抗衡，又受到后者吸引，故接受了欧共体的改编。参见马瑞映：《疏离与合作：英国与欧共体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欧盟与北约的东扩交替进行，将越来越多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纳入西方轨道。几轮东扩之后，政治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显现。西方影响力穿透东欧腹地，直抵后苏联空间的核心地带。在东扩议题上，欧盟与美国目标一致。在对待俄罗斯的议题上，欧盟与美国最初也没什么分歧。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卢格（Richard Lugar）曾说：“克服欧洲的分裂，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北约和欧盟将作出接纳新成员的历史性决定。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即便不是所有国家，也会是大多数国家加入这两个机构。而且，北约和欧盟都推出了扩大与俄罗斯合作的新举措。如果做得好，我们应该能确保欧洲新和平的工作基本完成。”^①

总而言之，冷战结束初期，大西洋两岸对如何实现欧洲秩序存在基本共识，那就是，既要扩大西方阵营，也要与俄罗斯保持必要的合作。这个方案总体上是自由主义的，并得到了欧洲国家的长期支持。美国全力推动“扩展民主地带”，不断拉拢欧亚新生国家，与它们各取所需，形成利益交汇，并在政治上不断接近。

三 美国对俄接触政策的消长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以胜利者自居，以“自由开放”的态度处理国际事务。此时，理想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理念在美国对外政策辩论中取得话语权。在自由主义者眼中，既然过去能将德国、日本等战败国纳入战后国际体系，那么，这种经验值得推广到俄罗斯身上。这不仅能够显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自由、开放”属性，也能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提供合法性依据。于是，美国按自由主义蓝图建设冷战后世界，对转轨的俄罗斯开始全面接触。

一方面，经过长时间的冷战对抗，美国国内出现了享受“和平红利”的愿望。在全新的时代，继续推行对抗政策变得不得人心。冷战时，美苏对抗把体系层面的压力引入国内，对民众生活造成全方位影响。当时美国为了做好战争准备，不断扩大情报机构，并强化国内治安体制^②。冷战高潮期时，社会审查和监视政策让行政权力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20世纪60年代，约

^① Richard G. Lugar, “Redefining NATO’s Mission: Preventing WMD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3, 2002, p. 8.

^② [日] 入江昭：《我们生活的时代》，王勇萍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

约翰逊政府甚至认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内的“鸽派”。约翰逊曾指示联邦调查局严密监视鸽派参议员，以确定这些人是否受到莫斯科的操纵。他还指示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对反战运动进行严密监控，诋毁其领导人形象^①。冷战结束后，既然苏联威胁已经消失，人们有充分理由让生活回归正常。可以说，来自国内的压力迫使美国政府找到代替对抗的其他路径。

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兴起，和平主义扩散，催生了“全球公民”意识，国际关系进入追求合作的繁荣时代。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在政治上全面对立，在经济上相互隔绝，这造成全球资源错配和国际分工扭曲，严重制约了全球经济增长。冷战结束后，这些导致低绩效的外部因素逐渐消失，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分工合作成为可能。在此背景下，全球化成为后冷战时期的主要议题。通信和交通科技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国际贸易、资本流通和人员交往，使全球整合成为大势所趋。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地球村”“全球公民”“世界主义”等新思潮随之兴起。在“全球化即美国化”的社会共识下，美国投身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动全世界的密切联结^②。

在经济社会原因之外，冷战后的地缘政治现实也是影响美国选择的因素之一。两极格局瓦解后全球各大重要地缘政治板块动荡不断。各地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有些表现为极端好战的激进思想。此前被美苏对抗所掩盖的各种矛盾纷纷浮出水面，与极端主义思想相混杂，在偶然事件刺激下演化成激烈的政治对抗甚至是族群冲突。面对混乱局面，美国需要承担更多的维持秩序的责任，因而应接不暇地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其结果是，美国军费支出不降反升，对外使用武力更加频繁。为了分派责任义务，美国需要同其他大国保持合作。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美国在组织协调多边主义干预行动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经此一事，美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它也更愿意与其他大国进行协调。

另外，当时美国视德国和日本为主要竞争对手，并未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主要威胁。这一时期，“欧洲回到未来”“亚洲多极对抗”等现实主义预测影响着

① 赵学功：《富布莱特：美国冷战后外交的批评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08 页。

② 美、英、德等国资助 65 000 个非政府组织，专门从事针对俄罗斯的“民主扶持”活动。Sarah E. Mendelson, “Democracy Assistance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Russia: Between Success and Fail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2001, pp. 68 - 106.

美国决策者^①。从当时情况看，德国和日本才是美国警惕的两大力量中心。两德统一后德国国力呈现上升势头，“德国的欧洲”是一种潜在的风险。日本还没有经历“失去的十年”，对美国依然产生着“日本第一”的心理冲击。与这二者相比，转型之中的俄罗斯和中国算不上头号威胁。马斯坦杜诺指出，“美国的安全政策一直在朝制衡威胁的方向发展。美国官员试图说服德国和日本满足于‘部分大国地位’（partial great powers），并将犹豫不决的俄罗斯和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以此来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②。

总的来说，冷战后东西方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往势均力敌的对抗，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性胜利”。在西方看来，自由主义模式已经在五十年冷战对抗中证明了自身的活力。此时，西方需要做的是找到并支持亲西方势力，让它们在东方世界的内部成长起来。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思潮之下，美国期待冷战对手自主完成内部转型。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避免威胁俄罗斯，谨慎应对俄罗斯内部问题，甚至还为俄罗斯恢复威望提供机会，以期俄罗斯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例如，为了不影响叶利钦的选情，美方在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之前没有对北约东扩采取任何实际步骤^③。

在美俄关系总体缓和的背景下，俄罗斯开启了融入欧洲的进程。它加入七国集团的条件变得日益成熟起来^④。这无疑是当时执政者认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合理选择。接触政策的高光时刻是七国集团扩大为八国集团。八国集团作为制度性存在，见证了西方与俄罗斯的牵手。在那时，美国认为欧亚地区始终笼罩在“北极熊阴影之下”，美国在该地区不可能绕过俄罗斯而发展影响力^⑤。鉴此，美国

①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1990, pp. 5 – 56; Aaron L.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1993 – 1994, pp. 5 – 33.

② Michael Mastanduno,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 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1997, p. 57.

③ 进一步参阅陶文钊：《北约东扩与美俄关系（1993～1997）》，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0期。

④ 当然，早在接触政策看起来很成功的20世纪末，美国内部对该政策能否见效也是有争论的。

⑤ Rajan Menon, “In the Shadow of the Bear: Security in Post – Soviet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 179.

认为接触俄罗斯是极为必要的。这也奠定了这一时期美国欧亚政策的基础。从老布什政府到小布什政府，美国总体上遵循了接触政策的路线方针。

不过，进入 21 世纪后，新保守主义开始得势，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激进转向^①。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增加军事存在，推行以颠覆当地政权为目标的“民主改革计划”。在后苏联空间，美国不断煽动“颜色革命”，极大破坏了当地的政治平衡。重要的是，美国开始偏离与俄罗斯合作的初衷。“拓展民主”与“对俄合作”本来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当美国能适当照顾俄罗斯的关切时，后者接受并默认了西方影响力渗透到东欧和后苏联空间的政治现实。当美国全然不顾及俄罗斯的感受时，后者感受到的是严重的冒犯。

经过漫长的 90 年代，俄罗斯克服了它所面临的解体困境^②，逐渐恢复元气并在地区事务上发挥作用。21 世纪初，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俄罗斯经济因此快速发展。之后，俄罗斯开始在南高加索地区重塑影响力。俄格战争爆发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发生了逆转。曾几何时受到西方欢迎的俄罗斯贵宾，开始登上西方国家的制裁榜。2012 年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并不顺畅。克里米亚入俄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每况愈下。西方不仅中止了俄罗斯的八国集团成员资格，并对俄罗斯发起全面制裁。至此，美国对俄接触政策彻底走到了尽头。

四 美俄两种秩序观的碰撞

美俄最终走向对抗有迹可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曾数次尝试“重启”美俄关系，但每一次“重启”要么无疾而终，要么滑向进一步对抗^③。诚然，每次“重启”失败都有当时独特的原因，但是，多次“重启”均告失败，意味着必然有深层次原因在持续发挥作用。这就需要从美俄长时段交往的历史中寻找答

① 刘金质：《试评小布什的帝国外交》，载《国际政治研究》2004 年第 4 期。

② Jessica Eve Stern, “Moscow Meltdown: Can Russia Surviv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4, 1994, pp. 40–65.

③ 参阅傅勇：《俄美关系“重启”的战略分析与借鉴》，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9 期；张万里：《欧洲反导问题与美俄关系“重启”的前景》，载《俄罗斯学刊》2012 年第 1 期；黄登学：《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逻辑、领域与限度》，载《当代亚太》2017 年第 6 期；刘莹：《美俄关系“重启”的困境分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 年第 3 期。

案。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费伯尔说，“俄国和美国不是因为一个是共产主义、另一个是资本主义而卷入冲突。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它们都在争夺影响力”^①。这一洞见对于理解当代美俄关系仍具启发。

美俄两国各自都有超过两百年的大国经验，它们不惜一切机会扩张影响力。“英国学派”代表人物马丁·怀特认为，“大国生性要扩张。正是大国最充分地表现出扩张倾向。引证几个最明显的例子，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各自都有版图持续扩大的历史”^②。沙皇时期俄国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扩张，后来继承沙俄领土的苏联“则要维护沙俄时期的边界”^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丘吉尔保持了大英帝国，斯大林得到了东欧，罗斯福维护了大国合作，保证战后和平。他们各取所需，各自得到满足，故而达成《雅尔塔协定》”^④。

但是，雅尔塔体系反映的是二战后的权力格局。当这种权力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时，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特殊利益也就不复存在。这是东西方实力变化的后果，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系统性产物。东欧作为强权者的势力范围，摆脱了原来受到的控制。而苏联/俄罗斯在失去东欧之后，必须直接面对西方的安全压力。过去，美苏两国围绕东欧腹地争夺影响力；此时，两国在俄罗斯周边争夺影响力。故而，它们竞争的本质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还是冷战的延续。

毋庸置疑，美国的单极主张是排他性的秩序诉求。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和不受制约的霸权。作为冷战的胜者，美国的政策制定受到国家安全利益集团的深度影响。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始终是维持美国优势地位不受挑战。如罗纳德·塔门和亚采克·库格勒所说，“在当今的世界等级结构中，美国的支配地位是不可挑战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对世界坚定的领导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全球规制”^⑤。

① [美] 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牛可、翟韬、张静译，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 页。

② [英] 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宋爱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6 页。

③ [英] 斯蒂芬·布劳德伯利、[英] 凯文·奥罗克：《剑桥现代欧洲经济史：1870 年至今》（第二卷），张敏、孔尚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7 页。

④ 李庆余、任李明、戴红霞：《美国外交传统及其缔造者》，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270 页。

⑤ [美] 罗纳德·塔门、亚采克·库格勒：《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 年第 3 期。

随着新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美国国内形成共识,认为应当利用有利时机,确保美国长期拥有优势地位。为此,美国既要消除对美国的潜在不满,夯实美国“领导地位”的国际基础;也要建立针对潜在竞争者的威慑机制^①。进入新世纪,新保守主义的这些主张被小布什政府奉为主臬。美国“改变世界的信条”及其“全球干涉主义政策”相互推动,使其走上了“永久战争之路”^②。美国无所顾忌地推行其秩序主张,持续打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谓“体系挑战者”。

同样,俄罗斯也有排他性的秩序诉求。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者,对欧亚地区有内生的联系、自发的情感和惯性的坚守。冷战后不久,亨廷顿就曾指出,“俄罗斯正在建立一个在它领导之下的,以东正教为核心的集团,以及一个环绕它的相对软弱的由伊斯兰国家组成的缓冲带。俄罗斯将在不同程度上支配这些国家,并试图把其他国家的影响排除在外。它亦希望世界接受和支持这个体系。这就是叶利钦在 1993 年所说的‘俄罗斯在苏联领土上确保和平与稳定的特殊权力’”^③。

冷战后初期,也许是美俄之间确有默契,也许是美国鞭长莫及故不得不默许,俄罗斯事实上保有了“在苏联领土上”的特殊权力。随之而来的是欧亚地区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薛福岐指出,“欧亚地区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中心—边缘结构,俄罗斯位于结构的中心,其他国家处于边缘。俄罗斯与其他欧亚国家关系在国际法层面是平等的,但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却是不对等、不平衡和不对称的。继续维系这种结构(或者现状)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此也构成俄罗斯周边外交政策与实践的基本内涵”^④。

综上所述,美国的单极诉求与俄罗斯的特殊权力愿望都带有排他性。美俄这两种政策思路必然存在冲突。对美国来讲,“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市场民主体制将要也必须在欧亚地区生根发芽,俄罗斯固守已经消亡的苏联边界是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对俄罗斯来讲,美国的“自由化攻势”每取得一点进展,就意味着

① Richard H. Immerman, *Empire for Liberty: A History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from Benjamin Franklin to Paul Wolfowitz*,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17–218.

② [美]安德鲁·巴塞维奇:《华盛顿规则:美国通向永久战争之路》,于卉芹译,新华出版社 2011 年版。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2~143 页。

④ 薛福岐:《欧亚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区域研究的新视角》,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 年第 6 期。

俄罗斯遭受一次挫折，意味着“俄罗斯世界”继续向内塌陷。显然，一方之所得，即另一方之所失，二者之间是难以调和的零和博弈。

故而，美俄秩序之争持续存在，而且只要机会允许，双方都会主动作为，以拓展自身影响。“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本土弥漫着不安情绪，社会日常秩序受到影响。为回应国家安全需要，美国修订国家安全战略，把反恐目标置于战略优先位置。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入侵伊拉克，继而推动“民主改造计划”。十年反恐战争不仅耗光了克林顿政府留下的财政盈余，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迅速攀升的公共债务，同时也透支了美国的软实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美国的财政困境，此后美国开始战略收缩。

而在这一时期，“石油和天然气的国际价格持续上涨，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使俄罗斯大发横财”^①。经济处境稍有改观之后，俄罗斯有了“恢复自信”的政治动机。多尼米克·莫伊西指出，“最近几年俄罗斯在恢复自信，从冷战后的羞辱中走出来。美国总想以民主的名义改变中东的现状，俄罗斯则威胁改变高加索地区的现状，以恢复帝国地位。美俄之间的共同点，要比两国愿意承认的多得多”^②。

试想，冷战期间，美苏为了争夺影响力，不惜在广阔的第三世界全面竞争。在东欧主战场，美苏更是长期进行着令人窒息的激烈对抗。两极格局瓦解之后，西方影响不仅扩散至东欧，而且进一步穿透了原苏联边界。对俄罗斯而言，随着外围缓冲带不断消失，其在前苏联空间的优势地位受到侵蚀。相应地，俄罗斯的不满和焦虑不断累积。随着地区大国乌克兰倒向西方，欧亚地区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2021年5月，美国政府公开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面对强大的体系压力，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发酵，最终导致其对外政策反弹。俄乌冲突就是这一长期历史进程的局部后果。

五 欧亚和平的外部条件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能否实现停火与和平，不仅取决于直接当事方的态度，也取决于幕后参与者的态度，可能主要还是取决于后者。俄罗斯作为特别军事行

^① [瑞典] 斯蒂芬·赫德兰：《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

^② [法] 多尼米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姚云竹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动的发起方，其直接目标是乌克兰，根本目标则是站在乌克兰背后的北约。乌克兰既无法决定冲突何时开始，也无法决定冲突何时结束，或以何种方式结束，全程处于被动地位。鉴于俄乌之间的实力差距，而且两国没有信任基础，停火与和平不会从直接当事方内部产生。因此，要恢复和平，必须先从外部创造条件，消除阻碍和平的外部因素。

这就需要首先回答敌对各方究竟为何而战的问题^①。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理解，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解释为“拒止性威慑”（deter by denial）失败后的“惩罚性威慑”（deter by punishment）^②。2010 年 7 月，乌克兰通过《内政外交政策原则法》，放弃加入北约，从法律上巩固了国家的不结盟地位。2014 年 12 月，乌克兰废除该法，重新确定加入北约的政策方向。随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国内进程不断提速。在 2021 年美国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到达了不可接受的临界点。俄罗斯不断交涉，并通过军事演习传递政治信号。但是，俄罗斯“吸引别人注意的举动”，不仅没有受到重视，甚至反而受到轻视^③。

2022 年 2 月 9 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开始为期十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与此同时，乌克兰也针锋相对地开始为期十天的军事演习^④。此时，拜登政府刚修复

① 关于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可参阅 Donald M. Snow, *When America Fights: The Use of U. S. Military Force*, Washington: CQ Press, 2000; Susan A. Brewer, *Why America Fights: Patriotism and War Propaganda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Iraq*,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ol. Matthew Moten ed., *Between War and Peace: How America Ends Its Wars*, NY: Free Press, 2011; [美]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陈定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② John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③ Quint Forgy, “‘Russian Concerns Were Basically Ignored’: Putin Slams U. S. Response to Moscow’s Security Demands”.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02/01/russia-ukraine-tensions-worsen-00004070>, 访问时间：2025 年 2 月 15 日；Agnieszka Nimark, “Putin’s Red Line over Ukraine: A New Test of European and Transatlantic Resolve”, https://www.cidob.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7/702_OPINION_AGNIESZKA%20NIMARK_ANG.pdf, 访问时间：2025 年 2 月 15 日。

④ Christopher Miller, “Russia, Belarus, And Ukraine Have All Begun 10 Days of Military Drills, Raising Concerns That War Is Near”.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christopherm51/russia-ukraine-belarus-military-exercises>, 访问时间：2025 年 2 月 15 日。

被特朗普政府破坏的联盟关系，需要对外展示出强硬姿态^①。故而拜登政府不仅对俄罗斯的威慑视若无睹，还火上浇油发出反向威慑。这样，俄罗斯的“拒止威慑”宣告失败。为维护自身战略信誉，俄罗斯进入“惩罚性威慑”阶段。俄罗斯从演习转入实战，发起了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此时，乌克兰作了数月准备，“战斗开始的前几个小时，总统及周围人员无一惊慌”^②。

俄乌冲突很快升级成为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不宣而战”^③，或者说美国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④。美国主流媒体把俄乌冲突完全归咎于俄罗斯。这种撇清自身干系的叙事方式掩盖不了美国和北约扮演的真实角色。俄乌冲突延宕至今已有三年之久，原因不仅在于直接当事方的战斗意志，也在于外部势力介入过深。因此，要实现停火继而建立和平，就不能把目光停留在直接当事方身上，而需要把外部因素纳入考虑范畴。不难发现，如果外部条件得不到满足，内部协调就没有现实基础。

理论上，在俄乌间实现和平，至少需要满足四个方面的外部条件。第一，美俄之间达成妥协；第二，俄欧之间形成谅解；第三，国际和平运动兴起；第四，国际社会的承认。前两个条件的满足，主要取决于冲突各方利益诉求的平衡，这将会是冲突各方在物质层面角力的结果。后两个条件的满足，则需要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参与，必须消除冲突各方的敌意螺旋，也必须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在上述条件中，美俄之间形成妥协是第一步，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2024年美国大选后，俄乌冲突的解决迎来转机。2025年2月12日，特朗普与普京进行正式通话，同意“结束这场流血冲突”，下令“各自团队立即开始谈

① 关于联盟政治的经典讨论，参阅 Glenn H. Snyder,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p. 461–495。

② The Kyiv Independent News Desk, “Zelensky’s Chief of Staff: We didn’t Believe Russia Would Invade Ukraine Until Very Last”. <https://kyivindependent.com/zelenskys-chief-of-staff-we-didnt-believe-russia-would-invade-ukraine-until-very-last/>, 访问时间：2025年2月15日。

③ 关于“不宣而战”的讨论，参阅 Kenneth B. Moss, *Undeclared War and the Future of U. S.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④ Jack Rasmus, “The Real Trump – Zelensky Minerals Deal”. <https://jackrasmus.com/2025/02/26/the-real-trump-zelensky-minerals-deal/>, 访问时间：2025年2月15日。

判”^①。2 月 18 日，两国代表团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美国在与俄罗斯谈判的同时，与乌克兰也保持密切沟通^②。与此同时，欧洲各方也共商对策，英、法等国领导人先后访问美国。不到一个月，“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领导人针对和平协议提出了各自构想，也划定了各种红线”^③。2 月 26 日，美国与乌克兰达成矿产资源协议^④。2 月 28 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计划签署已达成的协议，但访问以失败告终。

美乌爆发激烈争执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并不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乌克兰总统被迫离开美国后，前往欧洲寻求支持。欧洲领导人用谨慎的措辞作了回应，表示坚定支持乌克兰。但实际情况是，乌克兰在美国得不到保障，更不可能从欧洲得到保障，因为欧洲本身也是需要美国保障的对象。美国副总统万斯在 2025 年度慕尼黑安全峰会上明确指出，欧洲没有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因此，当英国首相被问能否“自己对抗俄罗斯”时^⑤，欧洲人应该意识到究竟是谁在为谁提供保障，又究竟是谁在为保障谁作决定。

在当前美国激烈反思是否为北约承担了太多责任之际，又怎会把安全保障的范围扩大到北约边界之外？这就是乌克兰面临的最大困境。当美国决意不再为保护别人的边境“埋单”时，谁也不能让它回心转意。这一点，恐怕法国人有最深切的体会。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积极参与凡尔赛和谈。为说服法国，美英

① Eli Stokols, “Trump Says He and Putin Will Negotiate to End the War in Ukraine”, *Politico*, Feb 12, 2025.

② Michael Williams, “Exclusive: Rubio Says Zelensky Should Apologize Following Oval Office Meeting”. <https://edition.cnn.com/2025/02/28/politics/rubio-zelensky-apology-trump-cnn/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5 年 2 月 15 日。

③ “Ukraine Peace Talks Explained: What’s Happening and What Could be on the Table?”. <https://fullfact.org/news/ukraine-peace-talks-explainer/>,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2 日。

④ Susie Blann, Hanna Arhirova and Vasilisa Stepanenko, “US Strikes a Deal with Ukraine that Includes Access to Its Rare Earth Minerals, Officials Say”. <https://apnews.com/article/russia-ukraine-war-economic-agreement-us-72ee2cfa720f6a42455c5425007060e6>,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2 日；Jack Rasmus, “The Real Trump - Zelensky Minerals Deal”. <https://jackrasmus.com/2025/02/26/the-real-trump-zelensky-minerals-deal/>,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2 日。

⑤ “Trump Asks UK Prime Minister If They Can Take on Russia by Themselves”. <https://edition.cnn.com/2025/02/27/world/video/trump-starmer-russia-ukraine-digvid>,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2 日。

两国承诺向法国提供安全保证，并与法国签署《法国安全条约》^①。美国在条约中承诺，“如果德国在没有被挑衅的情况下侵略法国，则美国向法国提供援助”。条约专门规定，“美国总统应将该条约与凡尔赛和约同时递交参议院”。但是，威尔逊从未将这项条约递交参议院，该条约“悄无声息地死亡了”。此后法国人将威尔逊称为“世纪无赖”^②。

当前欧亚地区形势与一战后欧洲形势极为相似，欧洲对身边的威胁充满恐惧，而美国又不愿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美国缔约机制要求凡是涉及安全议题的国际协议必须经过参议院批准程序^③。一百多年前，欧洲人可以说服威尔逊，但后者无法说服参议院。今天，欧洲人连特朗普都说服不了，更别提尝试让后者去说服参议院了。虽然欧洲人高调宣布要团结起来对付外部威胁，但要扛起美国卸下的担子，恐怕欧盟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能力。欧盟现在需要的是让威胁远离自己，需要的是彻底削弱俄罗斯，需要的是乌克兰战斗到底。因此，对乌克兰而言，求助欧盟无异于缘木求鱼。

一言以蔽之，“越大越好”的北约承诺已经破产，取而代之的是“越大越不安全”的非预期后果。欧洲各国必须反思，北约东扩二十多年后欧洲更安全了吗？如果安全环境得到改善，就没有必要增加军事开支。欧洲各国也必须反思，追随美国推行对抗性政策是否为自己赢得了回报，继续推行对抗性政策会不会带来更坏的结果。在美俄已经在为未来关系寻找出路时，欧洲应该行动起来，而不是惯性延续全面对抗政策。

总之，冷战后 30 年的西方身份建构，特别是北约身份建构，不断加剧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俄乌冲突就是这种对立结构下的系统性产物。因此，要实现俄乌停火，推动欧亚和平，俄乌美欧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建立安全框架，走出北约这座

① 在 1938 年版的《美国条约集》中可以看到这项胎死腹中的条约。这项序号为 No. 679 的安全保证条约，并没有获得正式条约编号（Treaty Series No., T. S.），参议院的审议行动为“未采取正式行动”。Garfield Charles, *Treaties,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 Acts, Protocols, and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Powers: 1789–1937*,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8, Index, p. 5720。

② 〔美〕亚历山大·乔治、朱丽叶·乔治：《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张清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91 页。

③ Nicole Deller, Arjun Makhijani, and John Burroughs eds., *Rule of Power or Rule of Law? An Assessment of U. S. Policies and Actions Regarding Security – Related Treaties*, London: Apex Press, 2003, p. 31.

囚禁所有人的思想的牢笼，消除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人的对抗心态。用爱德华·萨义德的话说，“需要抵抗这个时代大量存在的还原论的和庸俗化的‘我们 vs. 他们’的思维方式”^①。只要“我们”的安全是以“他们”的毁灭为条件，那么，安全永远也得不到保障，和平始终也难以建立，更无法持久。只有当“我们”承认“他们”的存在，正视“他们”的关切，和平才有希望。

结 语

三十多年前，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引发了国际政治的链式反应。从东欧到苏联，政治解体又激发了民族矛盾与社会分裂，造成了思想对立和身份冲突。面对经济停滞、社会失序和政治动荡诸多困境，欧亚各国各自思索着未来的出路。转型过程中充满挫折与反复，各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困境，因而需要得到国际援助和政治支持。这也让美国有了深度介入地区事务的机会。

长期以来，美国试图改造冷战对手，推广市场经济和西式民主，并以制度化方式拓展西方边界。随着西方影响力不断扩大，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当美国的自由化攻势持续进行，威胁到俄罗斯希望维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时，双方的隐性斗争导致了显性后果。美国的自由化攻势，不仅冲击了原苏联的地理边界，也撞击了俄罗斯的心理边界。最终，两种单极主张发生激烈碰撞，并引爆了一场军事冲突。

俄乌冲突不是单纯的双边冲突，而是一场体系性冲突。这场冲突的体系属性，决定了冲突的解决方案不能局限于直接当事的俄乌双方。进一步而言，只有当体系层面的矛盾得到适当的调解，单元之间的协调才有可能进行。在这之后，和平才有希望到来。

（责任编辑：聂侯诚）

^① 〔美〕爱德华·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58 页。